

林语堂精选集

世纪文学·60家

shiji
wenxue
60jia

北京燕山出版社
·出品·

shiji
wenxue
60jia

世纪文学 60 家
林语堂著

林语堂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精选集 / 林语堂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3 (2010. 11 重印)

ISBN 978-7-5402-1758-7

I. 林… II. 林…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331 号

林语堂精选集

作 者 林语堂

编 选 者 李 勇

责任编辑 张红梅

封面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3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1 月第 4 版 2010 年 11 月第 4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出版前言

20 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20 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上承 19 世纪,下启 21 世纪的 20 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一个古老民族焕发出青春活力的精神写照,更是一笔浓墨重彩、彪炳史册的文化财富。20 世纪的华文文学必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构成为后世所传承,20 世纪的那些杰出的华文文学作品必将作为经典为后人所记取。

抱着共同的目的和相同的旨趣,以“世界文学文库”树立了良好品牌形象的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白烨、倪培耕,著名学者和文学批评家陈骏涛、贺绍俊总策划,开始了这项以“世纪文学 60 家”命名的策划、评选活动。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创编与推出,旨在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 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进一步促进先进文化的积累与经典作品的传播,满足新一代文学爱好者的阅读需求。为使“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评选、出版活动,既体现文学专家的学术见识,又吸纳文学读者的有益意见,我们采取了专家评选与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秉承客观、公平、公开的原则,力图综合各个方面的意愿与要求,反映 20 世纪华文

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体现文学研究专家的普遍共识和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取向。

基于上述评选宗旨和评选原则,经专家推荐,我们依据 20 世纪华文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经过反复推敲和斟酌,确定了 100 位作家及其代表作作为候选名单。其后,又约请 25 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组成“世纪文学 60 家”评选委员会,在 100 位候选人名单的基础上进行书面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为顺序,产生了“世纪文学 60 家”的专家评选结果。为了吸纳广大读者对 20 世纪华文作家及作品的相关看法和阅读意向,我们得到了在国内最具人气的“新浪网·读书频道”的鼎力支持和全力合作,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华文‘世纪文学 60 家’全民网络大评选”活动。2005 年 12 月 16 日,读者评选结果在“新浪网·读书频道”正式公布。

为了使“世纪文学 60 家”的评选与编选,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最终以各占 50% 的权重,得出了“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名单。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入选作家,均以“精选集”的方式收入其代表性的作品。在作品之外,我们还约请有关专家撰写了研究性序言,编制了作家的创作要目,其意都在于为读者了解作家作品及其创作上的特点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必要的导读和更多的资讯。

“世纪文学 60 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 20 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托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此书系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 60 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冷静超远的幽默

李 勇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难为其定位,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他的作品至今仍为中国读者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所喜爱,探究他的创作历程和文学成就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

林语堂的一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游学成长时期,时间为1895年至1923年。第二个时期为北京时期,时间约为1923年至1927年。第三个时期是上海时期,时间为1927年至1936年。第四个时期为海外时期,时间为1936年至1966年。第五个时期为台湾时期,时间为1966年至1976年。

第一个时期是林语堂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他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形成的时期。林语堂1895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漳州的龙溪县坂仔村。祖上世代都是农民,但其祖母已是基督教徒,其父林至诚则已成为当地有名的牧师,属加尔文教派,其母也是基督教徒。但是牧师还不能算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林语堂父母的真正身份仍是农民,他们平时参加农业劳动,只是在农闲、夜晚或节日中才从事宗教活动。基督教家庭背景至少使林语堂从小就

对宗教信仰十分熟悉。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成为他的基本人生信念。另外,由于林家与外国传教士有直接或间接来往,林语堂从小就对西方文化有了直观的认识,甚至从小就开始学习一些英文单词,这都为他后来的留学和出国埋下了伏笔。

对林语堂产生更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林至诚。这位牧师在当地很有名,也很有威望。他性格幽默诙谐,为人正直诚恳,对子女既有极高的期望,又顺从他们的天性。林牧师对西方文化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了解,他那时已经通过教会读物知道西方的牛津大学、柏林大学是世界上著名的学府,并经常对孩子们说希望他们将来能到这样的大学学习,这无疑为孩子们点燃了希望之火,为他们树立了远大的理想。

林至诚也沿袭着中国农村“放养”的方式教育子女。特别是对林语堂,林至诚有几分偏爱。林家有六男二女共八个孩子。林语堂在男孩子中排行第五。他天资聪明,也很顽皮。上学时总是不太用功,有时还逃学,但他的考试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1912年,林语堂十七岁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厦门寻源书院(教会中学)毕业,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从此,林语堂开始离开家乡,到上海、北京以至国外学习生活。一直到后来成名以后,他还深情地回忆说:“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以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①可见,童年时代与大自然亲近对于林语堂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林语堂自传》,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语堂进入大学以后,对基督教的信仰开始发生动摇。他刚进大学时还想学习神学,但不久就转到语言学,专攻英语了。他广泛阅读了西方近代社会和自然科学著作,对于耶稣的复活等神话越来越不能相信。但是直到1916年他大学毕业到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工作后,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初到清华学校时,林语堂还参加礼拜日的讲道活动。因为他无法想像没有了基督教信仰,人生的意义靠什么来维持。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位同事告诉他,不信仰上帝,我们仍然可以做个好人,林语堂才打消了顾虑,放弃了基督教信仰,选择了人文主义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

1919年,二十四岁的林语堂在清华学校工作满三年,获得了官费奖学金赴美国深造。在出国前,他与厦门的富商家小姐廖翠凤结婚,婚后两人一起去了美国。林语堂进了哈佛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后因经济困难,1920年转入法国勤工俭学,并于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随后,林语堂又进入了德国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2年便获得了博士学位,研究的方向已不是比较文学而是语言学。

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对林语堂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林语堂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听过新人文主义理论家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课,但他并不赞同那种强调道德、规则、教养的古典思想,反而赞同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表现论思想,支持批评白璧德的斯平格恩(J. E. Spingarn),强调展示个性和情感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在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都有直接表现。另外,在国外的留学生活,使林语堂改变了中国文人清高的人格传统,使他勇于面对市场的挑战,这为他后来自己编杂志

和靠稿费维持生计做好了准备。

1923年,林语堂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任英文和语言学教授,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时期。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林语堂到北大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退潮的时期。新文化阵营内部的矛盾日益显现。原来《新青年》周围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等为主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源、徐志摩等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林语堂属于“语丝”派。“语丝”派的文学观念是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这种文学观念与林语堂所赞同的表现论文学观是一致的,也是他从小养成的自由率真的个性表现。在政治立场上,林语堂也和“语丝”派的其他同仁一样,同情弱者,支持弱者,反抗压迫,抨击军阀政府迫害学生和下层民众的种种暴行。在首都革命中,林语堂还亲自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并在与警察的搏斗中受伤。林语堂有一种远离官僚政府的本能倾向。他热爱的是率真的生活,向往的是无拘无束的人生。正是在这个时期,林语堂完成了从一个学院派的学者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首先,他以当时流行的随笔、杂感等形式表达了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事件的观点。比如对于当时十分热闹的泰戈尔来华访问,林语堂就撰文指出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民众的欺骗。其次,林语堂在这些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独立立场,实践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这一时期林语堂的创作并不在形式上追求精妙完美,但表现出的个性却十分鲜明。这些文章总是直接切入议题,简洁明快地表达观点,不仅立场鲜明而且热情洋溢。就主题而言,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关于社会问题的分析,并不直接针对某个具体人物或事件。比如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和现实(国情)问题的讨论。另一类

则是直接针对某些人(主要是“现代评论”派)的具体言论而展开的。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种种闲话和流言,林语堂都给予坚决回击。就对象来说,林语堂重点批评的是以“公正”自居,实际帮官府说话的文人。当然,官府的种种恶行也是批判的对象。

林语堂对军阀政府和闲话家的激烈批评招致了军阀政府对他的迫害。1926年,占领了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下令通缉了一大批进步人士。林语堂、鲁迅、周作人等都上了黑名单。为了逃脱军阀的魔掌,林语堂应厦门大学之聘,离开北京去厦门,在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随后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等进步知识分子也来到厦门大学。但由于厦门大学内部文理科之间存在竞争,人际关系也矛盾重重,更重要的是官方势力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对立十分尖锐,沈兼士、孙伏园、鲁迅很快就都离开了厦门大学。林语堂也随后离开,到武汉革命政府外交部短暂停留后,1927年林语堂便来到上海进入了他人人生旅程的第三个时期。

林语堂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除了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任外国语编辑主任和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处长外,主要的活动是写作和编杂志。其实,在中央研究院的职务都是闲职,并没有多少事要做,林语堂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文学活动上。到上海的初期,由于《语丝》杂志也迁到了上海,林语堂继续为这份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杂志写稿。由于他已熟练掌握英文,也为英文版《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写专栏文章。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由时代书店出版,1934年又创办了《人间世》半月刊,1935年创办《宇宙风》十日刊。这些杂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论语》杂志创刊之后,销路极好,引起众多文人争相效仿,文学界掀起了办

文学杂志的热潮。办杂志赚钱,这本来是通俗文学家才做的事,现在新文学家也可以这么做了。在这方面,林语堂做出了贡献。

当然,林语堂并不是为了赚钱才去办杂志的,他有自己的文学理想。1929年林语堂就在《语丝》第五卷三十期上发表了《新的文评序言》,其后又在同一杂志同卷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了《Benedetto Croce 的〈美学:表现的科学〉》,介绍表现论的文学和美学思想,这正是林语堂自己的文学观念。1930年林语堂编译的《新的文评》由北新书局出版,更系统地介绍了这种表现论文学思想和批评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这部著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就他自己创办主编的几种杂志来看,林语堂也提出了独特的文学思想。《论语》提倡的“幽默”,是这份杂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幽默不同于通俗文学中的笑话或滑稽,按林语堂的解释,幽默是人的心灵的解放,是对古板教条和诸种不合理现象的嘲弄,是人的真性情的流露,所以“幽默”与表现自我个性的文学观是一致的。他说:“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世事看穿,必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烂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①与此相一致,《人间世》提供小品文,也是从表现自我的个性,抒写自己的心灵感悟出发的。从政治立场看,林语堂也没有因为提倡表现自我的个性或提倡幽默而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天地中,而仍然是关心社会现实的。对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林语堂都给予了嬉笑怒骂式的批判。对于当权者,他甚至敢于指名道姓地加以嘲讽。比如在日本侵略东北、国势危急的关头,国民政府主席

① 林语堂《论幽默》,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四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森却在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受到了林语堂幽默的批评(《吾家主席》)。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也成为《论语》杂志重点批评的对象。这些活泼、率真、有趣的风格,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杂志赢得了销路,实际上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林语堂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一方面是他自己一贯的文学观念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上海社会生活环境使然。林语堂到上海以后,基本上过着自由职业者的生活,适应残酷的生活现实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林语堂在市场上的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他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市场,但他也决不像通俗文学作家那样迎合市场。他只是不回避文学的商业性质,并不认为文学的商业性质有什么罪恶。同样,在文学观念方面,他始终把文学看成是表现个人的情性的活动,而不以救世主的姿态发表宣言。但是他对专制统治和官僚政府的批判也是十分尖锐的。

1936年8月,林语堂一家乘“胡佛总统号”客轮赴美国,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海外生活,林语堂的人生也进入了第四个重要时期。林语堂赴美,起因是他的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美国出版,并荣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此书的出版联系人、美国作家赛珍珠因此书的成功而建议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林语堂当时并没有决定移居美国,只是想做一年的访问。他们全家离开中国时,订的是为期一年的往返船票。可是没想到1937年7月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林语堂一家也就滞留美国,一留就是三十年。除了在欧洲和新加坡不长的旅居之外,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

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三十年,主要身份是自由作家,主要活动是

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有人批评他是向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其实他向中国讲西方文化并不多,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则是很多的,也算是他在海外的主要贡献。他的活动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为改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所做的努力。当林语堂到达美国时,美国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仍然是很片面的,他们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传教士和商人、军人的书信和游记,其中充满了偏见、误解和歪曲。要么把中国想像成一个落后的未开化的野蛮国家,要么又把中国美化成世外仙境般的乌托邦。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中国也成为一个新闻热点,西方人很希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真实的、新鲜的消息,他们很希望了解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赛珍珠的《大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因其作者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又是用英语直接向西方人讲述中国的状况,所以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林语堂也沿着这个路子推出了该书的姊妹篇《生活的艺术》,同样获得成功。两本著作在中国读者看来可能存在许多缺点,但在西方世界,它们却重新塑造了中国形象。林语堂也写到了中国的诸多缺点,但是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生存智慧的国家,她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克服自身的缺点,克服各种困难,延续自己的文明传统。二是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为中国争取英美为首的同盟国的支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林语堂的著作在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畅销之时,他本人也成为文化名人。在各种公开场合,他经常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抗战的艰苦,宣传中国人抗战之英勇,表达中国必胜的坚定信念。除了在《纽约时报》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媒体上发表分析中国抗战的文章外,他还利用接受采

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机会,为中国的抗战做宣传。三是创作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其中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红牡丹》等都是名作。这些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却是中国的社会生活,作者所要表达的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旨趣。所以,这些作品处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很难在文学史上定位。但是林语堂的这些作品所获得的成功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在客观效果上,这些文学作品也在向西方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信息,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形象化地展现了出来。四是通过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不仅将中国儒家、道家、佛家的重要典籍译成英语,而且还翻译了《浮生六记》等笔记、小品文和一批话本小说。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下,林语堂将中国文化输出国门,为弘扬中华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语堂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据他的女儿回忆,在美国他常穿中式长衫,他讨厌西服领带是出了名的。人到了晚年,叶落归根的愿望也越强烈。1963年,年近七旬的林语堂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深情地回忆了家乡的青山绿水和浓郁的乡情。1966年,林语堂在海外漂泊了三十年之后,毅然决定回到祖国,定居在与漳州老家一水之隔的台湾。从此也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后的旅程。回国后的林语堂,仍然是一个自由文人,所从事的也还是著书作文的文化活动。其实早在1964年,林语堂已应邀为台湾的“中央社”写一个名为“无所不谈”的专栏,这是他中断了三十年的汉语写作的新起点。他的这些杂感随笔与早年的“语丝”文体十分相似,以至于这个专栏里的文章汇聚成集的《无所不谈合集》成为

他晚年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与早年的锋芒毕露、刚猛凌厉相比,晚年之作更显出一位长者的睿智与风趣。最后的十年,也是林语堂文学活动的收获时期。1968年,他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台湾分会”会长,出席了在法国蒙顿召开的第三十六届国际笔会,1970年,他以七十五岁高龄筹备了在台北举行的亚洲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于同年出席了在汉城举行的第三十七届国际笔会。1975年,林语堂八十岁,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四十届国际笔会上,他被推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京华烟云》也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成就得到了国际文学界的公认。可以说,林语堂是迄今为止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作家之一。

纵观林语堂的一生,从早年在北平参加《语丝》杂志的活动到晚年《京华烟云》获诺贝尔奖提名,他的一生始终都与文学活动有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活中,林语堂的文学成就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观念方面,林语堂所提倡表现自我个性的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史上具有独特性。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史上,人性论和阶级论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且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或明或暗地贯穿在现代文学观念史整个过程中。林语堂提倡表现论,既不赞同阶级论,也不赞同普遍人性论。他从自我性情出发,强调纯真的、活泼的心灵世界的自然表达,反对外在规范的束缚。这种自我本位的文学观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第二,提倡“幽默”,对现代散文理论与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幽默”在林语堂那里不仅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美学风格和人生境界。对“幽默”的理论阐释和提倡,不仅使中国现代散文中的这

一类文体得到支持,而且对现代人格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对中国古代的小品文和“性灵”说的重新阐释,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的探索。本来周作人等对于明代小品文的现代意义已有论述,但林语堂在自己所办的《人间世》上大力提倡,并以小品文为主要文体之后,小品文的影响力逐步扩大。他将小品文看成是现代人人自由表达自己情感的文体,也就赋予了这种文体现代意义。他用西方浪漫主义者表现自我的理论来解释“性灵”,挖掘出了古代文论的现代含义,是有创见的。

第四,散文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活泼、率真、敏锐而又不失深刻。与许多刻意经营的散文家不同,林语堂的散文是随意的,不事雕琢的。但是这些作品今天仍然拥有大量读者,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风格中有真实自我的情感态度,贴近读者的所思所想,又能出其不意,发人未发。比如早年的《有不为斋解》和晚年的《来台后二十四快事》看似简单罗列,但都让读者有痛快淋漓之感,就是因为它们活泼、率真又不乏俏皮。

第五,长篇小说虽然以英语写作,在国内的影响远不如在国外影响大,但这些作品的文学成就仍然是很高的。小说中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丝毫不逊色于任何现代汉语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结构安排,意蕴的创造,也都有很高的水平。除了得到公认的《京华烟云》之外,《风声鹤唳》中的故事更加连贯曲折,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几位主要女性都刻画得十分细致生动,抗战背景下大家庭风雨飘摇的生存状态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应该说林语堂驾驭长篇小说的才能是优秀的。

第六,创办文学期刊屡获成功,为作家创办文学杂志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是他的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的文学成就之一。当时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很多,文坛领袖和普通文学青年往往都拥有自己的刊物作为发表作品的阵地,但是能迅速在市场上畅销的纯文学杂志并不多。林语堂办的几本杂志都有比较好的销路。这是值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认真研究的课题。如果从恢复当时上海文坛历史原貌角度看现代文学史,林语堂的这几本杂志的影响力是无法回避的,相应地,林语堂的文学史地位,也应作相应的调整。